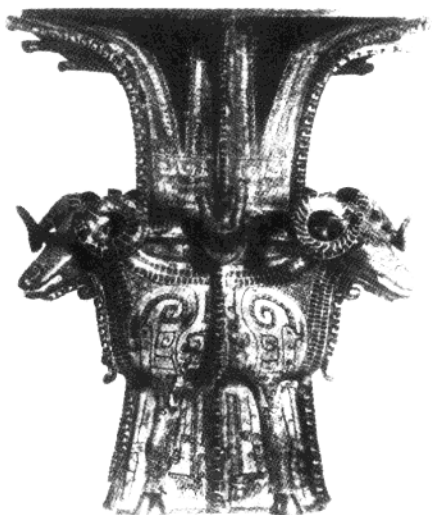




商周青铜器 与楚文化研究

高至喜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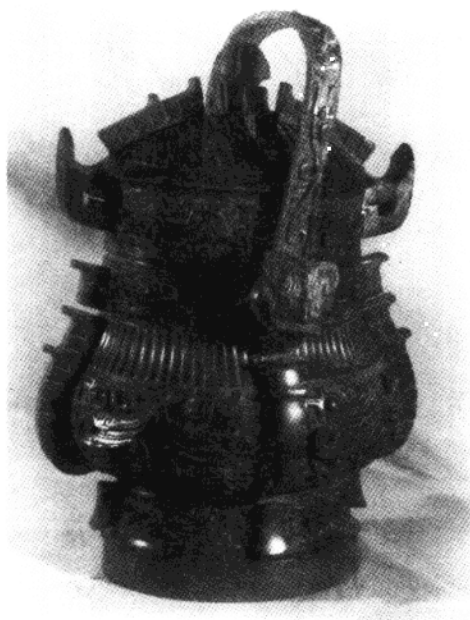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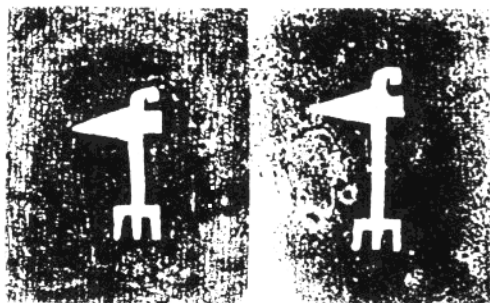
1



2



3



4

图版壹

商代青铜器

1. 四羊方尊
2. 兽面纹提梁卣(圈足后配)
3. “戈”卣
4. “戈”卣铭文拓片(右:盖内 左:底内)



1



2

图版贰

1. A 型铜铙

宁乡县月山铺转耳仑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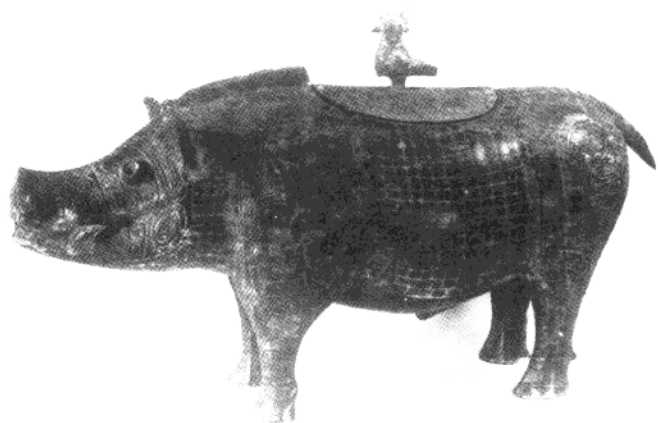
2. B 型铜铙

宁乡县老粮仓师古寨出土

3. B 型铜铙鼓部象纹



3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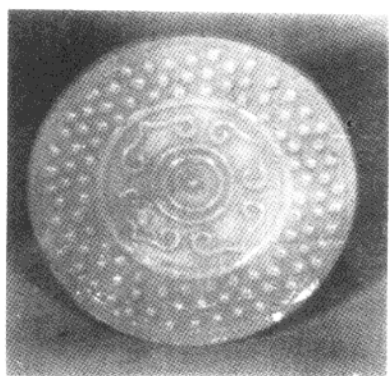
2

图版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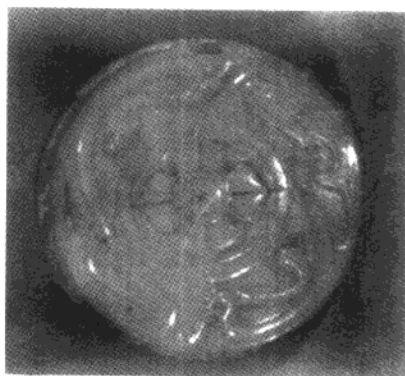
1. 青铜豕尊 湘潭县金盆养鲤出土
2. 青铜牛尊 衡阳市包家台子出土
3. 青铜桑蚕纹尊 衡东霞流市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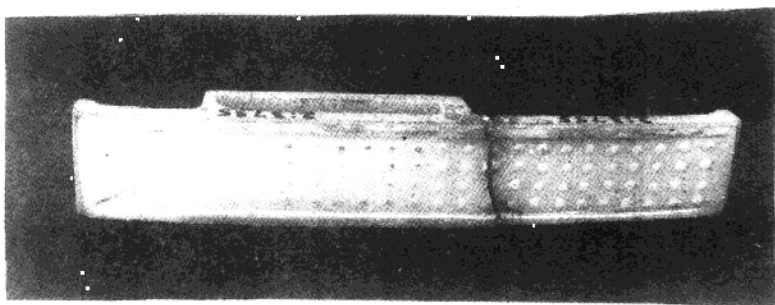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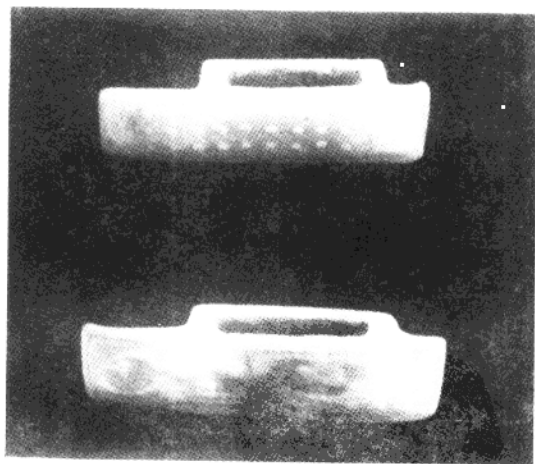
1



2



3



4

图版肆

玻璃剑饰

1. 剑首 1955 年长沙白泥塘 M2 出土
2. 剑首 1956 年长沙黑槽门 M5 出土
3. 剑珥 1956 年长沙左家塘 M7 出土
4. 剑珥 1954 年长沙枫树山 M34 出土
5. 剑珥 1955 年长沙下大垅 M19 出土

5

目 录

论中国南方出土的商代青铜器·····	(1)
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	(15)
论中国南方商周时期铜铙的型式、演变与年代·····	(27)
论商周铜铸·····	(38)
“商文化不过长江”辨——从考古发现看湖南的商代文化·····	(48)
谈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青铜乐器·····	(54)
湖南商周农业考古概述·····	(59)
论湖南出土的西周铜器·····	(69)
马簠的年代与族属考·····	(80)
湖南新出越族铜器的年代与特点·····	(82)
关于晋侯苏编钟的来源问题·····	(92)
刮刀起源小议·····	(94)
西周士父钟的再发现·····	(96)
从长沙楚墓看春秋战国时期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98)
再论湖南楚墓的分期与年代·····	(104)
论长沙浏城桥一号墓和杨家湾六号墓的年代·····	(109)
楚国西周铜器初论·····	(115)
论湖南春秋楚墓·····	(122)
论战国晚期楚墓·····	(131)
记长沙、常德出土弩机的战国墓——兼谈有关弩机、弓矢的几个问题·····	(145)
湖南楚墓中出土的天平与砝码·····	(155)
论楚镜·····	(159)
楚俑研究·····	(180)
湖南出土战国玻璃璧和剑饰的研究·····	(208)
论我国春秋战国的玻璃器及有关问题·····	(213)
谈谈剑饰名称问题·····	(227)
湖南出土楚文物研究综述·····	(230)
楚人入湘的年代和湖南越楚墓葬的分辨·····	(239)
略论秦镜及其与楚镜的关系·····	(245)
从长沙秦和西汉早期墓葬看楚文化的延续和影响·····	(254)
马王堆汉墓中的楚文化因素分析·····	(260)
略论湖南出土的青瓷·····	(266)
长沙出土唐五代白瓷器的研究·····	(275)

论长沙窑的年代与分期·····	(285)
长沙窑的兴衰初探·····	(290)
论湖南秦墓·····	(297)
从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出土文物看西汉早期兵器的发展·····	(307)
后 记·····	(315)

论中国南方出土的商代青铜器

中国南方的商代青铜文化问题，是历史考古学界十分关注的一个课题。1950 年以前，长江以南地区虽然曾零星出土过商代晚期铜器，但多已散失或流失国外，很少有学者论及。在古代文献中，也几乎找不到有关中国南方商代铜器的记载。新中国成立之后，江南地区相当于商代的文化遗址，包括铸造铜器的遗迹遗物被不断发现，商代青铜器更是不断出土，精美绝伦的重器也多有所见，已引起国内外许多学者的浓厚兴趣。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中国南方商代铜器的发现与分布、年代与分期、特征与分类、来源与影响等问题，谈几点看法，请大家指正。本文所指中国南方系指长江以南的湘、赣、苏、浙及两广等地区。云贵川地区本文拟不予论及。

一 发现与分布

至目前为止，中国南方已发现的商代铜器大体可分为四个地区，即湖南、江西、江浙（包括安徽的江南部分）和两广地区。

（一）湖南地区

湖南是中国南方发现商代铜器最多的地区之一。前些年，又在石门县皂市发现相当于商代中期（二里冈上层）的铸铜遗迹和铜器，为研究我国南方的商代青铜文化提供了新资料。

石门县皂市商代遗址发现于 1960 年^①，当时没有发现铜器。1977 年冬和 1981 年冬两次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共 1400 余平方米，获得大量商代文化遗物，特别是发现有相当于商代二里冈期的小件铜器和铸造铜工具的石范（图一、二）^②，还发现有铜渣（图三）、熔铜炉等。皂市商文化遗址可分为三期，第一、二期的陶器可分为文化渊源不同的甲、乙两组。甲组的典型器物是釜、鼎、罐、碗、豆，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乙组的典型器物是分裆袋足鬲、簋、假腹豆，以及爵、斝、大口尊、大口缸等，与郑州二里冈所出同类器物基本相同，说明乙组器物的出现是受中原商文化的强烈影响所致^③。

湖南出土的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共约有 300 件。建国以前出土的有：

1922 年桃源县漆家河河岸出土的“皿天全”方罍，器身已流失国外，下落不明。器盖现藏湖南省博物馆。盖内有“皿天全作父己尊彝”八字铭文^④。

1938 年宁乡县月山铺转耳仑出土著名的四羊方尊（图版壹，1），是商代青铜器中铸造最精的代表性器物^⑤。

现藏于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的虎食人卣（又名饕餮食人卣，乳虎卣），据传出自安化县与宁乡县接壤处；现藏于法国巴黎的虎食人卣，与安化所出那一件风格相同，出土地点不详。

现藏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的两羊尊，据传出自长沙县跳马涧。现藏于日本东京根津美术馆的两羊尊，也与湖南所出商代铜器风格一致。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鸟饰罇^⑥和美国纽约萨克勒氏收藏的鸟饰罇具有我国南方铜器的特点，有可能出自湖南。

湘潭市原福建会馆出土有兽面纹大铙，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新中国建立以后，湖南出土的商代铜器有：

石门县出土的兽面纹提梁卣(图版壹，2)和“父乙用享”簠(图四)^⑦。

岳阳县青龙出土的兽面纹圆尊^⑧；鲢鱼山出土的鱼纹圆尊^⑨，造型奇特；费家河出土的兽面纹大铙^⑩。

华容县出土的兽面纹圆尊^⑪，器形高大。

桃江县出土的“𪚩”盃^⑫。

益阳县谢林港出土的兽面纹卣^⑬。

宁乡县出土商代铜器最多。主要出在黄材一带，计有：寨子山的人面纹方鼎^⑭(图十)、水塘湾的“己夔”分档鼎、炭河里的“癸夔”提梁卣及卣内的1100余颗玉珠、管^⑮、王家坟山的“戈”卣(图版壹，3、4)及卣内的玉管、玉环、玉玦等320多件^⑯、寨子山的兽面纹卣及卣内的线条纹斧224件^⑰、三亩地的云纹大铙^⑱及玉器、刮刀、栗家冲的宽援直内戈、木榔子山的兽面纹觚^⑲、米良桥乡侯家嘴的龙纹刀^⑳；另，老粮仓师古寨出大铙5件，内有象纹大铙2件、虎纹大铙2件、兽面纹大铙1件^㉑；月山铺转耳仑出象纹大铙1件，重达221.5公斤^㉒；唐市陈家湾出兽面纹大铙1件^㉓；老粮仓北峰滩出兽面纹大铙2件，1件重154公斤，另1件稍轻，器内有四只伏虎装饰^㉔；松木桥出土云纹镂空双翼形铙。

湘乡县狗头坝出土兽面纹铙^㉕。该县还曾出土兽面纹爵，高32.8厘米，是爵中较大者(图五)^㉖。

望城县高冲出有兽面纹铙^㉗。

长沙县东山出有鸮卣^㉘。

浏阳县秀山土地坡出有兽面纹提梁卣^㉙、柏嘉出土兽面纹大铙，兽面的眼睛饰一蹲踞的蟾蜍^㉚。

湘潭县九华金盆养鲤出土豕尊^㉛、青山桥一窖中出“旅父甲”尊^㉜。

醴陵仙霞狮形山出土象尊^㉝。

双峰县金田月龙出土鸮卣，内贮玉玦、玉璜等^㉞。

新邵县陈家坊出土云雷纹卣^㉟。

衡阳市包家台子出土牛尊^㊱。

常宁县出土牺首兽面纹方尊(图八)^㊲。

邵阳市祭旗坡出土“𪚩 □ 𪚩”爵。

从长沙、株洲等地废铜仓库收集有兽面纹鬲(图七)、百乳簠、“蚩戈父”鼎(图六)、龟纹鸮卣、虎纹钺(图九)、戈、宽叶矛等数10件^㊳。

(二)江西地区

江西地区出土商代铜器较多，特别是清江吴城遗址出土不少商代铜器和大量铸造铜器的石范，为研究中国南方商代青铜文化开辟了新的领域。

清江县吴城出土长条形铜刀、铜器盖和铸造刀、戈、铤、钺、矛、钺及容器的石范^㊴。

吴城正塘山M3出土平底铜卣2件及铜铤、铜钺和铜片各1件^㊵；另发现云纹直内铜戈2件和云雷纹长骹柳叶形铜矛1件^㊶。

锄师脑出土虎形扁足鼎、鸟形扁足鼎各1件。

新干县出土豎耳深圆腹鼎^㊷。

都昌县乌云山出弦纹觚1件、弧刃铜斧2件、铜铤6件^㊸。

永修县松峰出土双翼铜钺 2 件⁴⁵。

遂川县洪门村出土兽面纹提梁卣 1 件，盖、底内分别铸“亚夷皇”、“亚夷皇渐”铭文⁴⁶。

(三)江浙地区

江苏、浙江地区出土商代铜器较少。浙江有：

长兴县杨桥出土的叶脉纹钺、上阳出土的蝉纹铙、港口出土的云雷纹戈⁴⁷。

余杭县石滩出土的云纹铜钺⁴⁸。

吴兴县袁家汇出土的云纹戈 2 件、戚 1 件。

还有安吉、海盐出土的鼎、觚、爵、案足和甗等⁴⁹。

江苏地区的商代铜器主要出在宁镇地区，计有：

南京市锁金村的双翼形钺、刀、鱼钩⁵⁰；北阴阳营的钺、斧、刀和太岗寺的钺、刀⁵¹。

句容县白蟒台的钺、鱼钩⁵²；赤山湖水库和后白的直内戈、葛村的钺⁵³。

还在南京的安怀村、窖子山、江宁的沟墩、镇江的断山墩等湖熟文化地层中发现有冶铸铜器的遗存和小件铜器。南京北阴阳营还发现有炼铜的陶钵、挹灌铜液的陶勺，江浦护国庵也出有同样的陶勺⁵⁴。

商末周初的铜器还有溧阳夏村的爵、尊；江宁的三羊罍、横溪的钺⁵⁵。

另外，湖北阳新县白沙出土的云纹铜钺⁵⁶，其器形与纹饰同浙江余杭、江苏江宁、安徽潜山⁵⁷所出铜钺的风格相同，故附于此区。

(四)其他地区

福建尚未发现商代铜器。两广地区出土的商代铜器也很少，可以早到商代的铜器只有广东饶平县顶大埔山、海丰县的戈⁵⁸，广西武鸣县的兽面纹提梁卣、戈，兴安的“天父乙”提梁卣⁵⁹。有学者认为，这些铜器“有可能是后代埋藏的”⁶⁰。

二 年代与分期

我国江南出土的商代铜器，根据现有资料，大体可分为两期四段，即相当于商代中期（二里冈上层）和商代晚期。商代晚期又可分为早、中、晚三段。分别叙述如下。

(一)商代中期

代表性的器物有湖南石门皂市、江西清江吴城和江苏南京出土的 3 批。石门皂市遗址的铜器是小件工具钺、凿、鱼钩、铙；出土的石范是铸造工具斧和铙的。皂市出的双翼形钺、鱼钩，与郑州二里冈期的钺和鱼钩⁶¹十分相似；皂市出铜器的同一地层中出土的陶器分裆袋足鬲、宽平沿直腹高圈足簋、假腹豆、甗和红陶大口缸等，与郑州二里冈期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故应大体同时，属商代二里冈期上层。

江西清江吴城文化第一期的铜器有长条形刀、青铜器盖，还出铸造铜工具铙的石范，新干的竖耳深圆腹鼎。“吴城一期常见的鬲、豆、罐、盆等器物，与郑州二里冈商代遗址的同类器物较为接近”⁶²，唐兰先生也明确提出吴城文化“第一期相当于郑州二里冈上层文化，时间为商代中期”⁶³，李伯谦也认定吴城文化“一期相当于商代二里冈期上层”⁶⁴。新干出土的深圆腹鼎，彭适凡定在商代中期⁶⁵。

江苏地区最早的铜器出自湖熟文化下层，多为钺、刀、斧、凿、鱼钩等小件铜器⁶⁶。经 14C 测定，北阴阳营上层的两个标本的年代分别为前 1540 ± 90 年（树轮校正为前 1820 ± 135 年）、前 1195 ± 105 年（树轮校正为前 1387 ± 165 年），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中晚期。

有人研究吴地青铜器的结果，也认为“吴地的铜器铸造大致在二里冈期受中原商文化的影响而产生”⁶⁶。

江南其他地区未见有早到商代中期的铜器。

上述3批资料证明，长江中下游地区，基本上都是在与商代中期(二里冈期上层)同时铸造铜器。

(二) 商代晚期

江南出土的商代青铜容器和乐器，基本上属于商代晚期，又可分为早、中、晚三段。

早段有代表性的铜器是江西清江吴城文化第二期的铜器，如正塘山 M3 所出的𦣟、蝉纹𦣟、𦣟和铜片。吴城二期文化的地层中出土有大量铸造刀、戈、𦣟、矛、钺等的石范，一灰坑中出有铜戈。𦣟为平底短柱、腰和腹部饰圆圈带和变形云纹，戈为长援直内有栏，与商代二里冈期的器形和纹饰风格接近，年代偏早。李伯谦认为吴城文化第二期相当于殷墟早期⁶⁷，应属商代晚期早段。正塘山另出直内铜戈和云雷纹长骹柳叶形铜矛，也属早段。湖南湘乡出土的大爵，所饰兽面纹尚无地纹，浙江长兴上阳出土的蝉纹𦣟与江西清江吴城二期所出铜𦣟纹饰相同，也应同时，均属商代晚期早段。

中段延续时间较长，属于这一段的铜器最多。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兽面纹甗及甗内的线条纹斧、“癸 夙” 卣、“己 夙” 分裆鼎、象纹、虎纹和兽面纹大铙，石门的兽面纹提梁卣，桃源的“皿天全”方彝，岳阳的鱼纹尊、兽面纹尊、大铙，华容的圆尊，桃江的盃，益阳的角，长沙的鸛卣，湘潭的豕尊，醴陵的象尊，衡阳的牛尊，常宁的方尊等，均属中段之代表性器物。这些铜器的器形与纹饰，与张长寿所概括的殷商晚期第二期铜器的特点完全一致⁶⁸。如这一期出现有方彝(湖南桃源漆家河出有方彝)、鸛卣(长沙东山出鸛卣)、角(益阳出角)等新器形；方鼎(宁乡的人面纹方鼎)是此期的代表性器物；铜器胎质比较厚重；花纹都比较繁缛，出现了所谓三层花纹(如方彝、岳阳的鱼纹尊、大铙等)；动物形纹饰很流行，有虎纹(见于大铙、象尊、虎纹钺等)、象纹(见于醴陵象尊，象纹大铙等)、鸛纹(长沙的鸛卣)、大的兽面纹等；三角纹、蕉叶纹(见于四羊尊)更为普遍；扉棱普遍应用于方彝、方鼎、觚、尊等器形上；不少铜器上出现了族徽或比较短的铭文(如癸 夙、己 夙、大禾、旅父甲等)。

江西清江锄狮脑的虎形扁足鼎和鸟形扁足鼎，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或扁足鼎和小屯 M18 出土的 52 号鼎⁶⁹，都是折唇、浅腹、圜底、扁足，器形相同，纹饰风格相似(只是清江鼎的立耳上分别有立虎和立鸟，有所区别)，说明其年代亦应相近。妇好墓和小屯 M18 均属殷商晚期第二期⁷⁰，故可定在商代晚期中段。

浙江安吉出土的觚、甗，从器形纹饰风格看，均与妇好墓所出同类器物相同。安吉周湾所出铜鼎，形制较为特殊，器腹似鬲，器足象𦣟，其纹饰仍属商代晚期青铜铸造鼎盛期的作风，故也可定在中段。

商代晚期晚段的铜器在江南分布更广，有地方特点的铜器更多。

湖南地区商代晚期晚段有代表性的铜器有石门的“父乙用享”簋、宁乡三亩地的云纹大铙、王家坟山的“戈”卣、收集的“𦣟 戈父”鼎、百乳簋等。按殷墟铜器的分期，商代晚期最后一段铜器的特点是：鼎足为圆柱形实足，足根部饰兽面纹(如“𦣟 戈父”鼎)，斜腹百乳簋、两侧有耳的簋是较晚兴起的器形(如收集的百乳簋和石门的簋)，因此，这些铜器均属商代晚期晚段。宁乡三亩地的云纹大铙，以云纹为主纹，兽面已大大退化仅剩两只凸出的眼睛，因此，云纹大铙的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晚段。浙江余杭、江苏江宁、湖北阳新的铙，均

以云雷纹组成兽面为主纹，风格相同，其年代亦应相近，均可定在商晚期晚段^①。

浙江长兴出土的叶脉纹铜钺，原报告定在春秋^②，牟永抗、刘兴定在商代^③，何纪生、何介钧定在西周^④，我认为可定在商代晚期。在郑州二里冈和湖北黄陂盘龙城就出土有商代中期的铜钺，商代晚期的双肩式铜钺甚为流行^⑤。此钺形制与中原商代铜钺稍异，如内较长，刃的弧度较大，两刃上翘，钺身无圆孔，但从基本形态看，似乎仍是受中原商代钺的影响铸制的，叶脉纹则明显是仿自南方的印纹硬陶纹饰，这类叶脉纹在吴城文化第二期就可以见到，商代晚期更多^⑥，故此钺的年代宜定在商代晚期偏晚。

浙江吴兴袁家汇出土的云纹戈、戚，牟永抗说：“按纹样特征可订为商代中期”^⑦，刘兴也定在商代中晚期^⑧，何纪生、何介钧认为时代“似可定为西周”^⑨，年代相差甚远。我意定在商代末期为宜。戈上的方格纹与长兴钺上的方格纹风格一致；以云纹作为铜器的主要装饰，江南地区已在商代末期流行，故此3件戈、戚可早到商末。

三 特征与分类

中国南方出土的商代铜器与中原地区的商代铜器比较，它们之间既有许多相同部分，也可以看出南方铜器的地方特点。

(一) 相同部分

器形方面：商代中期的铜器南北一致，如双翼形镞、鱼钩、锥、凿、刀等；商代晚期南北相同的铜器有扁足鼎、分裆鼎、方鼎、簠、爵、斚、觚、鸛卣、提梁卣、方尊、圆尊、戈、铍、刀等。

纹饰方面：兽面纹、云雷纹、象、虎、羊、夔龙、凤鸟、蕉叶、鱼、米字形纹、弦纹、涡纹、乳钉等纹饰，南北无别。

(二) 地方特点

江南商代铜器的地方特点，主要表现在一些商代晚期的器物上，表现在只见于江南的那些铜器上。从器形看，较典型的有：

1. 大铙 主要出在湖南的湘水流域。铙是一种仰击的乐器，作合瓦形，下有圆筒形甬，甬上有旋。虽然这种大铙的基本形状可能受到中原商代小铜铙的影响，但两者有明显的区别：南方大铙器形高大厚重，最大的重达221.5公斤，多数甬上有旋，多单个出土，使用时植于座上仰击，均出于窖藏。而中原商代的铜铙器形很小，甬上无旋，手执而鸣，三五个成组出土，多出于墓葬，有的有铭文，纹饰更是全然不同^⑩。浙江余杭、江苏江宁、湖北阳新出土的商代末期的以云雷纹为主纹的铜铙，多有圆圈纹框边和衬地，甬部无旋，这类铜铙主要见于长江下游地区，而中原未见，与湖南地区所出铜铙也有区别，应是吴越地区所产的特有乐器。

2. 线条纹斧 湖南宁乡黄材寨子山出土的1件商代兽面纹铜甗内贮铜斧224件，益阳、华容、邵阳等地也有出土，共计235件^⑪，都出在属于印纹硬陶文化的范围之内，也就是古代越族文化的地区，在北方看不到。这类铜斧上的横三竖四的线条纹，仅见于江南。北方出土的商代铜工具多为素面，有纹饰的多为“十”字、三角、“工”字形等纹饰，山西石楼所出铜斤、铍、凿上，也有竖线条纹^⑫，但组合风格不同。器形也各异，北方铜斧、铍，均作长条形，刃较窄平；而宁乡斧身较短，刃较宽、弧度较大，这是江南地区特有的青铜工具。



1. 酒具盒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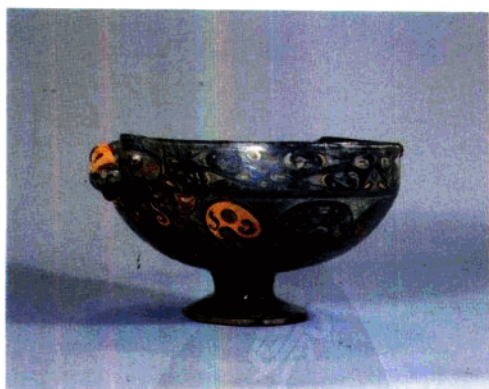
2. 双连杯2:189 (俯视)



3. 双连杯2:189 (侧视)



4. 凤纹带流杯2:31



5. 龙纹带流杯2:25



6. 漆筒2:70

址中,到二里头文化时,青铜铸造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江南的青铜铸造技术来自中原的可能性最大。

三说是分别起源于中原和南方。彭适凡、华觉明等认为,“我国冶金术有可能分别起源于中原和南方,南方可能是我国冶金术最早发祥地之一”⁹。曾昭燏、尹焕章同时提出“冶铜技术为荆蛮族的发明,也是有可能的”¹⁰。

根据目前所知的考古资料证明,我们认为第二说较为可信。理由是:

1. 黄河流域出现铜器的时间很早。虽然有的学者对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铜器仍持怀疑态度,但对距今 5000 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中出土的铜器则已没有疑问¹¹,至于龙山文化、二里头早商文化中出现的铜器已更多。就目前资料说明,黄河流域出现铜器的时间比江南要早 1000 多年。发明冶铜技术早的地区传入晚的地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2. 现在已发现的江南几个商代铸造铜器的中心地区,其最早出现铜器的时间都在二里冈期。这一时期所出土的铜器与中原所出器类相同,如湖南石门市所出是凿、镞、锥、鱼钩及铸造斧、斨的石范(图一,1~6);江西清江吴城所出是条形刀(图一,11)、器盖;江苏所出是镞、刀、斧、凿、鱼钩(图一,7~10、12、13)及鼎耳、铜条等。我们再看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所出的青铜工具也都是小件器物,如铈、凿、锥、刀、鱼钩、镞,还有爵、铃等器¹²;其他如洛阳东干沟出有铜刀;夏县东下冯出铜镞、铜凿;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和齐家文化中所出铜器也是刀、锥、斧等工具。黄河下游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中的铜器仍是这一套小件工具和装饰品¹³。郑州二里冈所出铜器也是镞、凿、刀、鱼钩、斧、钺(图一,14~21)等。南北早期的铜器不但器类相同,而且器形也非常相似。如镞均双翼长铤,鱼钩几无差别,圆形锥均作细长棒状;江苏“湖熟文化”所出铜镞与郑州二里冈所出铜镞都是“体扁平,有突起后锋外侈,铤颇长,形制可说是完全一样”;“湖熟文化”遗址中所出的铜刀、铜鼎耳、铜鼎足,样式都和郑州、安阳所出同类器物相似¹⁴;铜刀与湖北黄陂盘龙城南 M1(二里冈上层偏晚)出土的铜刀器形一致。江西吴城第一期铜刀(秋 T7 ⑤:105)与郑州二里冈期的铜刀都是凹背长条形,尖上翘,器形相同。在吴城采集的属商代中期的青铜器盖上的 S 形雷纹,与盘龙城李家嘴 M1 出土的铜觚上的花纹相似;器盖上由变体云雷纹组成的对称的圆形兽面纹与中原地区商代中期的花纹作风也相同。商代中期南北铜器器形、种类、纹饰如此相似,充分说明江南的冶铜技术是从中原传过来的。

3. 商代二里冈期的陶器也传到了江南。澧水流域商时期遗存出土的陶器中有鬲、簋、假腹豆、爵、罍、伞状捉手器盖商文化所特有的器形,而“澧水遗存出现这些器物,显然在于商文化的影响”¹⁵。具有地方特点的陶器上某些细部也反映出商文化的影响,如陶鼎圆锥足的扉棱等。江南地区中原商文化陶器的出现,这是中原商文化向江南传播的可靠证据。冶铜技术随着传播过来,这是很合情理的事。

不但湖南石门市等地出有商代二里冈期的陶器,而且在江西清江“吴城一期常见的鬲、豆、罐、盆等器物,与郑州二里冈商代遗址的同类器物较为接近”¹⁶;李伯谦也指出吴城“一期乙组器物有鬲、盆、豆、长腹罐、伞状器盖、大口尊、爵、罍等物与二里冈上层者接近”¹⁷。“至迟在商代早期偏晚(即指二里冈期——笔者)吴城文化已与商文化发生接触,并受到后者的强烈影响”。吴城文化吸收了先进的商文化,连陶器的形状和纹饰都从商人那里学过来了,那么,对于当时生产中迫切需要的先进的冶铜技术应更会学习和运用。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江南的冶铜技术是从中原地区传过来的,这是有充足的理由和有大量考古材料为根据的。现在要解释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冶铸方法上有一些差别。吴

城地区铸造铜器以石范为主,陶范为辅,这和中原地区以陶范为主,石范极少,正好相反;还有湖熟文化中铸造铜器的用具“则常见厚胎陶钵和挹灌铜液的勺类”^③,也为中原所未见。对这些特点应作何解释?让我们先看看各地出土以石范铸造铜器的实例:1974年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下层发现铸铜斧的石范;甘肃玉门火烧沟齐家文化晚期地层出土铸铍的石范,其时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或早商文化时代;较晚的铸造铜器的石范南北均有发现,如唐山夏家店上层、赤峰红山后、广东海丰、云南剑川海门口和沙溪、四川会理瓦石田东周墓、陕西临潼秦都栎阳、江西萍乡等地均发现有铸造铜斧、钺、戈、铍、刮刀等工具和兵器的石范^④。上述考古资料告诉我们,黄河流域使用石范的时间比江南要早,看来江南石范的出现很可能也是受到黄河流域的影响。整个商周时期,南北均发现有铸造器形和纹饰都较简单铜器的石范。因此,石范铸造既标志青铜时代的初始阶段,也延续了较长时间,并不是江南所特有的,仅仅有多少之分,而无有无之别,这只反映事物量的差别,并不说明质的不同。因此,仅仅依据石范多陶范少来推断我国南方为冶金术的“最早发祥地之一”,尚嫌证据不足。

江南地区为什么在商代中期主要用石范铸造铜器呢?我推想可能有下列原因:一是当时江南学会铸造铜器的时间不久,而石范铸造是青铜时代的初始阶段,有学者指出“从铜器产生历史考察,最早使用的铸型应该是石范,石范铸造是青铜时代的初始阶段”^⑤。二是北方冶铜技术南传时,江南地区可能尚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部族林立,当时迫切需要的是金属工具和兵器,以适应农业生产和战争的需要,而对于青铜容器、礼器并非急需之物,而用石范铸造工具和兵器,已能满足需要,石范又具有可以多次使用的优点,故石范多,陶范少。大概到商代晚期,对青铜容器、礼乐器有了需要之后,陶范才多起来。湖南、江西、浙江等地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礼乐器,花纹繁缛,器形复杂,只有用陶范才能铸造出来,商代青铜器中的代表性产品四羊方尊就是用分块陶范法铸造出来的^⑥。至于宁镇地区发现的少量冶铸铜器的工具与中原地区所用“将军盔”等有所差异,并不能因此否定冶铜技术来自中原地区。江南在学习中原冶铜技术的过程中,采用某些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工具是不足为奇的。

江南地区商代晚期的青铜文化已发展到很高水平,某些铜器的铸造技术并不比中原逊色,甚至有所超过,如众多以动物为造型的铜器就是;有的铜器还对后世产生过重大影响,如铙、钲等乐器。

乐器是我国古代礼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铙、钟、钲又是古代乐器中的主要器物。过去不少学者在论及铙、钟、钲等乐器时,一般认为起源于中原地区,南方青铜乐器的出现均是受中原影响所致。如认为广西忻城甬钟是“由黄河流域传入广西的”^⑦;有的认为陕西“西周钟的滥觞”,“推测其时代大约在早周或先周”^⑧。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笔者曾经指出西周“甬钟是由南方的大铙直接发展演变而来”,“北方西周甬钟的出现应是受了南方大铙或甬钟的影响”^⑨,这一论点已得到一些学者的肯定^⑩。商和西周早中期的铜钲很有可能是南方的产物,湘水流域及其邻近地区是其主要产地。北方地区铜钲的出现,很可能是受到南方铜钲的影响^⑪。北南方的青铜文化应是相互影响的。

注 释

① 周世荣:《湖南石门县皂市发现商殷遗址》,《考古》1962年3期。

② 湖南省博物馆主办的湖南历史文物陈列商周陈列室。

③④ 王文建:《商时期澧水流域青铜文化的序列和文化因素分析》,《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

1989年。

- ④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图录》图版六，湖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
- ⑤ 同④图版五。
- ⑥ 石志廉：《西周虎鸟纹铜钟》，《文物》1960年10期。
- ⑦ 同④图版七，2。
- ⑧ 《湖南日报》1972年3月16日第4版。
- ⑨ 岳阳市文物管理所：《岳阳市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湖南考古辑刊》2。
- ⑩ 湖南省博物馆熊传新：《湖南新发现的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5)。
- ⑪⑫ 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编：《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图版30、32，文物出版社，1972年。
- ⑬ 现藏湖南省桃江县文管所。
- ⑭ 现藏益阳地区博物馆。
- ⑮ 高至喜：《商代人面方鼎》，《文物》1960年10期。
- ⑯⑰ 高至喜：《湖南宁乡黄材发现商代铜器和遗址》，《考古》1963年12期。
- ⑱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工农兵群众热爱祖国文化遗产》，《文物》1972年1期。
- ⑲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图29，文物出版社、株式会社讲谈社，1983年。
- ⑳ 熊传新：《湖南宁乡新发现一批商周青铜器》，《文物》1983年10期。
- ㉑ 长沙市文物工作队等：《宁乡出土青铜龙纹刀》，《湖南文物》第3辑。
- ㉒⑳㉓㉔㉕㉖㉗ 高至喜：《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湖南考古辑刊》2。
- ㉘ 益阳地区博物馆 盛定国等：《宁乡月山铺发现商代大铜铙》，《文物》1986年2期。
- ㉙ 同㉘图26。
- ㉚㉛ 湖南省博物馆等：《新邵、浏阳、株洲、资兴出土商周青铜器》，《湖南考古辑刊》3。
- ㉜㉝ 黄纲正等：《浏阳双峰出土商周青铜器》，《湖南文物》第1辑。
- ㉞ 湖南省博物馆 何介钧：《湘潭县出土商代豕尊》，《湖南考古辑刊》1。
- ㉟ 湖南省博物馆：《湘潭青山桥出土窖藏商周青铜器》，《湖南考古辑刊》1。
- ㊱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醴陵发现商代象尊》，《文物》1976年7期。
- ㊲ 衡阳市博物馆：《湖南衡阳市郊发现青铜牺尊》，《文物》1978年7期。此尊或名觥。
- ㊳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新发现的几件铜器》，《文物》1966年4期。
- ㊴ 同㊳图39、14、12、25、30。
- ㊵㊶ 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7期；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第四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资料丛刊》(2)。
- ㊷ 同㊵前一注。
- ㊸ 江西省清江县博物馆：《吴城商代遗址新发现的青铜兵器》，《文物》1980年8期。
- ㊹㊺㊻㊼㊽ 彭适凡等：《江西地区早期铜器冶铸技术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 ㊾㊿ 江西省博物馆等：《近年江西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文物》1977年9期。
- ① 梁德光：《江西遂川出土一件商代铜卣》，《文物》1986年5期。
- ② 长兴县博物馆 夏星南：《浙江长兴出土五件商周铜器》，《文物》1979年11期。
- ③ 王士伦：《记浙江发现的铜铙、釉陶钟和越王石矛》，《考古》1965年5期。
- ④ 浙江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出土商代铜器》，《文物》1986年2期；浙江省博物馆：《三十年来浙江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 ⑤ 南京博物院：《南京锁金村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3期。
- ⑥ 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北阴阳营第一、二次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1期；刘兴：《东南地区青铜器分期》，《考古与文物》1985年5期；江苏省文物工作队太岗寺工作组：《南京西善桥太岗寺遗址的发掘》，《考古》1962年3期。
- ⑦ 镇江博物馆 刘建国 刘兴：《江苏句容白蟒台遗址试掘》，《考古与文物》1985年3期。
- ⑧ 镇江博物馆：《句容县赤山湖及其附近出土的商周铜器》，镇江博物馆编《文物考古资料汇编》，1976年。
- ⑨⑩⑪⑫ 曹昭谦、尹焕章：《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江海学刊》1961年12期。

- ⑤⑥⑦ 邹厚本：《宁镇区出土周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 ⑤⑤ 戚博：《湖北省阳新县出土两件青铜铙》，《文物》1981年1期。
- ⑤⑥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五），《考古学报》1956年3期。
- ⑤⑦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出土先秦文物》，香港，1984年。
- ⑤⑧ 梁景津：《广西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78年10期。
- ⑤⑨ 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1986年4期。
- ⑥①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36页，图贰伍，科学出版社，1959年。
- ⑥①⑥③⑦⑧ 李伯谦：《试论吴城文化》，《文物集刊》（3）。
- ⑥② 唐 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7期。
- ⑥③ 彭适凡：《江西商周青铜器铸造技术》，《科技文集》4辑。
- ⑥④ 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年3期。
- ⑥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铜器》图一三四、一五〇，文物出版社，1985年。
- ⑥⑥ 同⑥⑤46、47页。
- ⑥⑦ 牟永抗：《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刘兴：《东南地区青铜器分期》，《考古与文物》1985年5期。
- ⑥⑧⑨ 何纪生、何介钧：《古代越族的青铜文化》，《湖南考古辑刊》3。
- ⑥⑩ 杜迺松：《青铜铙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1983年5期。
- ⑥⑪ 江西省博物馆“印纹陶问题”研究小组：《江西地区陶器几何形拍印纹样综述》，《文物集刊》（3）。
- ⑥⑫ 同⑥⑪前一注。
- ⑥⑬ 同⑥⑫后一注。
- ⑥⑭ 高至喜：《湖南商周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2期。
- ⑥⑮ 山西吕梁地区文物工作室 杨绍舜：《山西石楼褚家裕、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1年8期。
- ⑥⑯ 庄锦清 林华东：《福建南安大盈出土青铜器》，《考古》1977年3期。
- ⑥⑰ 同⑥⑱图版一四八、图三四。
- ⑥⑱ 同⑥⑱图版八九、一七〇、一七七、一九二、二二一。
- ⑥⑲ 熊传新：《湖南商周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湖南省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暨马王堆汉墓发掘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986年。
- ⑥⑳ 郭沫若：《十批判书》。
- ⑥㉑⑥② 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3期。
- ⑥③ 同⑥②；《考古学集刊》第6集。
- ⑥④ 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冶金史》编写小组：《中国冶金简史》33页，科学出版社，1978年。
- ⑥⑤ 蒋廷瑜 蓝日勇：《广西先秦青铜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 ⑥⑥ 蒋定穗：《试论陕西出土的西周钟》，《考古与文物》1984年5期。
- ⑥⑦ 同⑥⑥；梁柱：《越式青铜甬钟刍议》，《人类学论文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
- ⑥⑧ 高至喜：《论商周铜铎》，《湖南考古辑刊》3。